

佛教研究法

吕澂 著

佛学概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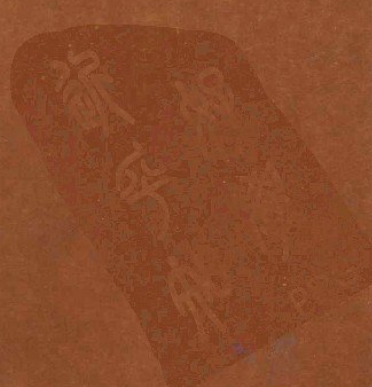
黄忏华 著

广陵书社

近代

佛

学丛刊



佛
教
研
究
法

吕澂 著

佛
学
概
论

黄忏华 著

广陵书社

近代

佛

学

丛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教研究法 / 吕澂著. 佛学概论 / 黄忏华著. — 扬州:
广陵书社, 2009.3

(近代佛学丛刊 / 曾学文主编)

ISBN 978-7-80694-303-8

I. ①佛…②佛… II. ①吕…②黄… III. 佛教—研究
IV. 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8221 号

书 名	佛教研究法 吕 澂著 佛学概论 黄忏华著
责任编辑	胡 珍
出版发行	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 邮编 225012 http://www.yzglpub.com E-mail: yzglss@163.com
印 刷	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开 本	652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2.75
字 数	182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94-303-8/B·33
定 价	28.00 元



出版说明

晚清民国初年以来,中国学术思想界风气大开,西学盛行,国学复兴。佛教学术研究一度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,佛教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,佛学报刊陆续出版发行,各地新兴刻经处刻印大量藏经典籍,僧俗学者如杨文会、黄忏华、欧阳渐、蒋维乔、丁福保、谢无量、释太虚、释印顺、陈垣、吕澂等潜心佛学研究,在佛教历史、经典、宗派、思想、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,均有丰富的著作问世。许多论著在当时既有学术开创意义,至今天仍有研究参考价值。为了保存近代佛学典籍,繁荣佛教学术研究,我们从中选取部分名家著作,重新整理出版。

《近代佛学丛刊》所选著作,内容涵盖佛教通史、专门史、佛学总论、宗派概述、佛经译释、人物传记诸领域,作者均为一时名家。列入首辑书目的有蒋维乔《中国佛教史》、释印顺《中国禅宗史》、释妙舟《蒙藏佛教史》、谢无量《佛学大纲》、黄忏华《佛学概论》、吕澂《佛教研究法》、杨文会《佛

教宗派详注》、黄忏华《佛教各宗大意》、丁福保《佛经精华录笺注》和陈垣《释氏疑年录》等,今后将陆续选刊其他著作。

此次整理出版,尽量以民国原刊本作底本,对原本中明显的排印错误作了订正。如蒋维乔《中国佛教史》中,人名、年号、著作等间有错讹,均径予改正。吕澂《佛教研究法》对于中国、汉、藏等文字的表述有时不够准确,易生歧义,整理时对个别文字略作修正。黄忏华《佛教各宗大意》等书中引用佛经较多,一般不用引号。等等。请读者注意。

广陵书社编辑部

2008 年 12 月

绪 言

佛教研究,应时代思想之需求,至今日而骤盛。好学之士厌薄物质科学不足资安心立命,辄改趋于佛教。然而佛教范围广漠,内容繁赜,得门犹难,况言入室。吾尝见徘徊迷失废然而返者众矣,是皆未知研究方法之所致,亟须有以救正之也。是篇所述,即欲指陈实际研究方法,以为初学之一助。大体以文献资料为主,区分藏经、佛传、教史、教理四部。各疏解其概略,列举参考典籍名目并释题,俾读者知研究某项则应读何书。前三部多据日域深浦正文氏之说,最后教理部则编者自抒其意,以知见之所系,不容疑似之说也。至于佛教研究资料,文献而外,犹有艺术一方面,编者当另篇论之,今不及焉。

第一篇 藏经

第一章 藏经之意义及其原本

佛教研究之根本典籍,首当推藏经。所余之古人撰述,类皆由是流出派生。故初学之士先应于藏经具清晰概念,而知佛教文献研究之所由始也。曰藏经者,乃我国对于佛教教典集成之总称,有时亦谓之大藏经,一切经,或三藏经。藏字是梵语毗荼迦 Piṭaka 意译,原语本指竹筐之属可容花果等者。佛典集成,其摄藏涵容亦犹是,故取喻为名。而于佛说一代之教,判为经律论三藏。我国翻译以较雅驯之词易之,谓为三藏。即经之集成名经藏,律之集成名律藏,论之集成名论藏。稍后更有藏经之称。经系梵语修多罗 Sūtra 之译,本意是线,谓能贯穿花束令不散失。佛说教理,经以贯摄之,亦犹夫线也,遂译称经。三藏之中,惟佛说教理解行之法,独得经名,自余则称律,称论。后世推广其意,以为佛教典籍莫不关系佛说,概可称经,故三藏又名藏经。至于一切经、大藏经之目,均属形容藏经浩瀚之意,自六朝以来即已通用,盖其原来久矣。日本自中世镰仓时代而后,亦仿用之云。

藏经之编纂,在佛灭度后未几即已行之。依现存巴利文律藏《小品》Cullavagga 之说,佛灭度后有愚痴比丘善贤窃以为幸,谓不复有佛制戒之拘束。佛弟子大迦叶闻而有感,急思合众编定佛说,以防非法非律之流行。爰于王舍城附近集五百大德比丘,举行佛说之编纂,是为佛说第一次结集。结集亦是梵语意译。原文僧羯諦 Saṃgīti 指会诵而言。盖当时编纂犹无书写记录,不过集众传诵,定其辞句,使不纷歧而已。



又所编定者但有佛说教理与戒条之二类,即所谓法与律。其种类殆无几,绝无如后世所称藏经之广博,然藏经之雏形骨干固具于是矣。至于后世本此而见于记录,因相承之流派,乃至记述言语之相违,以至颇有迳庭,原本究属如何,乃极费研究焉。

所谓记述佛典言语之相违者,其一类为巴利语 Pāli,又一类为梵语,亦曰散斯克语 Samskrit。盖佛教以传播之地理上可便宜的分为南北两方面。所谓南方佛教者,以今之锡兰岛为中心,由是散布于缅甸、暹罗、安南等地。北方佛教则以今之尼泊尔以北中国为中心,由是散布于朝鲜、日本等地。对照两方佛教观之,歧异处不一而足。尤著异者,即上述之言语相违也。南方佛教主用巴利语记录之佛典,北方则主用梵语记录之佛典,其界限颇判然。

巴利语佛典之记录,依锡兰《岛史》*Dīpawansa*之说,乃当锡兰阿跋耶婆荼伽摩尼王 Abhaya-vatṭgamani 时,始于大寺集众传写,犹是依据旧日口传,录成土语。以西历纪元计之,约在西纪前一世纪也。及后四百余年,当西纪后五世纪初,中印度摩羯陀国硕学三藏曰观音者,南来锡兰,辄以印度本土之巴利语重译锡兰土语之佛典,并益以各种注疏,三藏皆备,于是巴利语佛典见其大成。后来流传不绝,今锡兰、缅甸、暹罗等地皆有之。其暹罗所藏者,当西纪一八九三年国王秋罗隆高恩五世 Chulalongkorn V. 登极二十五年纪念,尝以暹罗文字刊行全部,以颁布各国大学及学会等,时人为之耳目一新云。

其梵语佛典乃依原始佛教语而复译为佛教梵语者。其与巴利佛典之先后,极为难考。但在佛灭度后六百年,即西纪后二世纪初,迦腻色迦王时,已经有之。至于近时始渐遍知于世。其执介绍之劳者,当先举英人荷德生氏 B. H. Hodgson。西纪一八二二年,氏尝官于尼泊尔,发见此国之富藏梵语佛典,辄以公余注力搜集。终得三百八十部新旧写本,提供欧洲学界。欧人其先但知佛典为巴利语者,至是震于庞大之梵籍,不胜其惊异之感。影响所及,研究者竞出,如彼有名之法国硕学比优诺夫 E. Burnouf 著《印度佛教史序论》, *Introduction à l'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*. Paris, 1845. 并译《法华经》, *Le lotus de la bonne loi*. Paris, 1852. 皆称杰作,即因荷氏之刺戟而率先反响者也。但荷氏于介绍梵本之外,又发表数多论文,均为斯学研究所必需。其于一八七四年所出之《尼泊尔西藏语文宗教论》, *Essays on the Language, Literature*

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, London. 则尤为集此类研究之大成者也。荷氏而后,英人莱特 D. Wright 继起,为第二次尼泊尔梵籍之搜集。莱氏为当地公使馆之医官,自西纪一八七三年至七六年间,苦心努力得梵语佛典三百二十余部,其外更得关于婆罗门教之多数古本,成绩遂远在荷氏之上。后剑桥大学教授奔独尔因之制总目录,称《剑桥大学图书馆佛教梵笈目录》。*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, Cambridge*, 1883 于中备有考订,资益佛典研究者固不俟言。乃至尼泊尔年代之推定、古代梵字之研究等,亦复多有借助于此也。

荷氏、莱氏皆于尼泊尔得多量梵籍,其地收藏梵籍独富者,盖亦有故。即当西纪第九世纪前后,回教徒侵入印度本土,以其“可兰贡献否则刀剑”Koran, Tribute or Sword 之精神,迫害异教,备极毒辣,所至之处,寺塔经卷莫不焚毁。由是中印之佛教徒不得不抱守遗籍,避祸他国。喜玛拉耶山间尼泊尔国,僻处一隅,即属僧徒趋避之一处。而其地早有佛教流行,兼以天气苦寒极适于梵笈之保存,故得移藏佛典,辗转抄写,流传久久,及于近世,而为荷氏等所发见。

尼泊尔搜集梵籍之事,自后虽陆续有之,但于佛教研究上别有价值者,乃在晚近对于西域中亚方面之探险踏勘。其事先有英人斯坦因氏 M. A. Stein 于西纪一九〇〇至〇一年在于阗有所发掘。又一九〇六至〇八年在甘肃敦煌大行发掘,所获至夥。次则一九〇四至〇六年有德人格隆威豆 A. Grünwedel 之高昌搜集,又一九〇九年有法人伯希和 P. Pelliot 之敦煌搜集,乃至一九〇九至一三年日本亦遣橘瑞超氏往龟兹一带发掘搜集,均有所得。其对于学界之贡献,可谓极大。不仅佛教研究之资料增多已也,佛教研究之方法上,亦因此启言语学的历史学的乃至考古学的研究之风,教理解释愈益精审而入微,间接及于东洋学研究亦得甚大之进步。此诚晚近学界一可庆幸之事也。

以上略说巴利语、梵语佛典之原本来历如彼。至于各类组织内容,则属于专门范围,今从省略。即由梵语之佛典原本渐有汉文之译本,又有藏文之译本(其中一部分仍由汉译重翻),展转复有蒙古语、满洲语之重译,日本语之直译或重译。种类繁杂,颇具百花缭乱之观。然而比较各译之短长,惟汉文所译即构成所谓藏经者,实最完美。其于量也,因译业创始极早,历久不衰,遂多独存之译本,今时他处皆不获观,而



全体之量亦庞然无比。其于质也，又以译业为我国国民性真挚之表现，济以我国文字之美妙，译家巧于应用，遂能曲畅玄文，发露奥理，殆较他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故佛典研究之资料，第一当推我国所译藏经。吾人得资取研究，实为无上幸事。乃若欧美人士之研究，因文字之扞格，勉强采用，每至有意外之谬解。举其一例，如法国有名中国学者娄弥优沙 A. Rémusat 尝译法显之《佛国记》，于西纪一八三六年刊行之。其译拘萨罗国一段原文“刻牛头旃檀作佛像”，误为刻牛头而取旃檀作佛像。英国有名之古物学者浮格生 J. Fergusson 据此译文，遂谓佛教崇拜牛头，乃属低级之宗教。（详见所著《树木及龙蛇崇拜》，*Tree and Serpent Worship*, London, 1868.）此种错解乃由不明我国文字结构而来。其他类似之误会，亦时时见之。故应用我国典籍精深探究，自有独到之处，欧美之研究但可为参考，不宜妄为附和也。

第二章 藏经之国译及印刻

我国翻译之藏经既为研究之主要资料，其内容组织等事，不可不先有所了解，以便应用。以次各章，即就此约略释之。

第一、翻译之性质，因译事常居我国佛教之主要位置，有译场之特别组织，故翻译各籍甚为完备。自后汉明帝时至元之初期，凡一千二百年间，翻译不绝。依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（西纪一二八五年）庆吉祥等所集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之统计，历代译家一百九十四人，译籍一千四百四十部，五千五百八十六卷。此长时期间译事，可分新旧之二期。旧译时期代表之译家，先当数姚秦之鸠摩罗什，次则后汉之安世高、支娄迦谶，吴之支谦，西晋之竺法护，东晋之佛陀跋陀罗，北凉之昙无讖，北魏之菩提流支，陈之真谛等，皆属一代之大师，而由印度、西域等地以来我国，故此时期亦可谓为外国法师主译之时期。其次新译期，则唐代玄奘独擅盛名。盖奘师留学印度，十七年间，博究五印之方言，精通教义之奥蕴。归朝以来，新制译法，努力移植佛典之原义，遂为译经史上开一纪元，而举莫大之劳绩。其后义净、金刚智、不空等，各自发挥独到之方面。此一时期亦可云本国法师主译时期。两期翻译后先相俟，而三藏渐以备矣。

历代翻译既积而愈多,为防散逸乱离之故,不可不有组织统一之目录。加以我国国民性尊视文字记录,于此复杂之翻译,自然有编录之要求。故自东晋道安编定《综理众经目录》以来,各家大小经录之辑成垂六十种,及今存在者犹二十余种,可谓极多。但其间精粗得失,殊不一律。比较组织严密近于完备者,唯《开元释教录》。此篇为唐开元十八年(西纪七三〇年)智昇所撰。其于典籍区分,翻译来历,叙述简当,久为藏经研究者之指针。如所总计当时现存之经典凡一千零七十六部,五千零四十八卷,后世每视此为藏经之定数,而通称藏经五千卷,可见其影响之大。但言实际藏经原无定数,因时代之推移、翻译之增加,乃至我国学者撰述之钦定入藏,其范围次第扩张,数量亦不绝变动也。

历代既有经录,约略限定藏经之范围,遂为刊版所依据。唐时雕版之术既兴,藏经亦渐有零刊本,此盖于文献可征者。至于全部藏经之雕版,则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(西纪九七一年)。时敕使者往益州监雕,故后世称为蜀本。此大业之完成在太宗兴国八年(西纪九八三年),前后历时凡十二年。出版未久,即流传于日本及高丽。而后公私刊版继续不已,至于最近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续藏本,前后版本有十四种。即宋福州东禅寺本、开元寺本(合称闽本),南宋思溪本(亦曰浙本)、磻砂本,元杭州本,明南藏本、北藏本、武林本、万历本,清龙藏本、杨文会本、频伽本,及影印续藏本是也。此中南宋绍兴二年湖州王永从一族发愿刊成之思溪本,又元至元十五年杭州普宁寺创刊之杭州本,及明万历十七年顷密藏幻余等创刊之万历本,日人尝以为宋本、元本、明本,与高丽刊本对勘,重刊一较完备之版本,即一时通行之缩刷藏经也。我国频伽本即据以翻印。至于万历本形式作方册,一破历来之折帖式,便于流布,为益良多,后来书本藏经悉取法乎此焉。

我国宋本藏经既刊成,高丽韩彦恭即来请一部归国。后高丽显宗二年(西纪一〇一一年),敕命刻印藏经,即以此为原本。其距蜀版之成,约二十八年也。后契丹受其影响,道宗咸雍四年(西纪一〇六八年)亦创刻藏之举。但高丽旧雕藏经不久即罹兵火,高宗二十三年(西纪一二三六年)更扩大规模从事重雕,乃集蜀本、丹本及初雕之国本比较对勘,费十五年余之岁月始渐观成,遂成空前之良本。日本尝据之刊印缩版藏经,而我国杨氏刊本即多用为原稿,频伽本复全数翻印,可谓久被



轻视之丽本晚近乃重兴于我国,亦盛事也。

其在日本,近世德川时代之初期始见藏经全部之印刻。是则先有伊势僧曰宗存者,模仿丽藏试作折刷。后有僧天海,于宽永十四年(西纪一六三七年)以来完刻木版活字之藏经,仍为折本式,似承宋元各版而来,世称为天海本或宽永寺本,又称倭藏。及宽文九年(西纪一六六九年),铁眼禅师复发起印刻藏经,以明万历本为式,作方册形,流通便利。但明本之错乱,亦因袭未改,不能当善本。宝永二年(西纪一七〇六年),京都鹿谷僧忍澈始以建仁寺所藏丽藏对勘铁眼本(通称黄檗本,以其为黄檗隐元之弟子也),历时五载,尽去其误脱各点。越前僧顺艺继起对勘,且于铁眼本缺如之五百余卷,悉数抄补。后建仁寺不戒于火,丽藏尽毁,惟二家之校本存,宛然犹丽藏也,不可谓非奇异之因缘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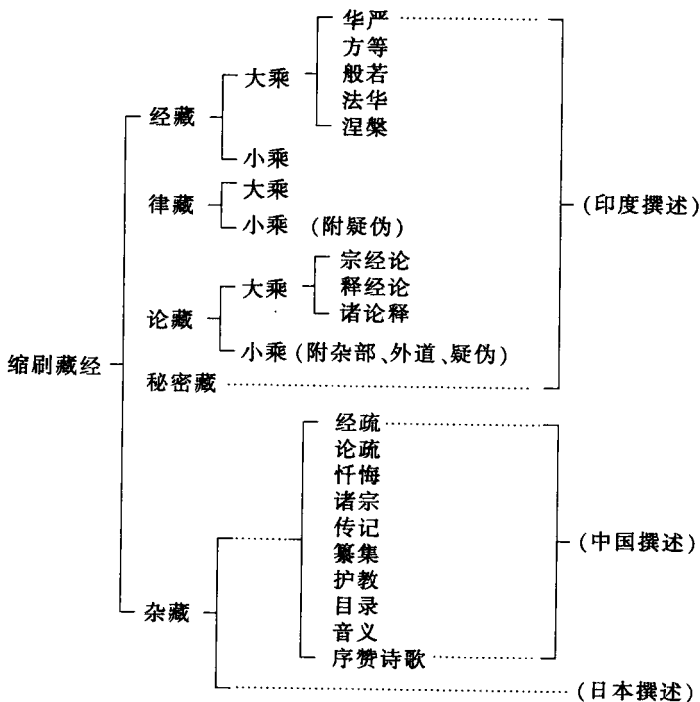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明治而还,泰西印刷之术直接输入,于是明治十三年至十七年(西纪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四年)间,有岛田蕃根等设弘教书院,而发起排印藏经。则以增上寺丽藏为底本,校以宋元明三本,字句异同悉记栏外,且互补缺文,施以句读,故最有学术之特色。且缩印小字方册本,请购取携均极容易,出版而后,学界便之。自余藏经书院有《已藏经》之印行,即用忍澈校本为蓝本,大体组织仍同明藏,其学术价值固远损于弘教缩刷藏经矣。至大正十二年(西纪一九二三年),高楠顺次郎、渡边海旭等创刊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,集一切版本原典精校重编,现虽发行伊始,然实大可注意之事也。

第三章 藏经之组织

各种藏经版本组织不一,互有短长。但现时研究较易请购者唯《频伽藏》。此系清末上海频伽精舍所印,纯以日本缩刷藏经为据,于撰述一部微有增损。而原本各处校勘附注概行削除,仅取其行款格式便于校印,可谓弃精华而取糟粕者也。其组织特别,仍沿缩刷藏而来,颇有可言者。

从来藏经组织大体依据《开元释教录》,先大分为经、律、论藏等部,更一一区别大小乘。其大乘经中用五大部之式,以般若、宝积、大

集、华严、涅槃，顺次排列为常。般若独居五部之首者，盖取般若为诸佛母之意。至于明代蕅益（智旭）遍阅大藏，提要以著《阅藏知津》一书，对于全藏组织锐意改革。则本其天台五时之说，分大乘经为华严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五部。合并《开元录》之宝积、大集并密经等以为方等，而别加法华，次涅槃之前，应五时之次第。其他律、论二藏亦多所改动。虽其立说是非犹待商量，然能以一家教判全变大藏之组织，于学术研究上固有足多者。日本排印缩刷藏经即采取其式而编辑，全藏大要如次，亦即《频伽藏》所仿效者也。



此种组织盖以经、律、论及秘密之四藏包括印度一切撰述，杂藏一种则网罗中国之主要撰述，兼及日本各宗开祖之述作，可谓大体完备。至大乘论分宗经等三种，即取法《阅藏知津》。其中宗经论即谓概括佛教全体之通申论，如《瑜伽师地论》、《三十颂》等，皆是。释经论谓注解一种经典之别申论，如《智度论》（释《大品般若经》）、《十地经论》（释《十住经》）等，皆是。诸论释谓各论典之注释，如《瑜伽师地论释》、《成唯识论》等，皆是。又小乘论附录三类。杂部指义通大小抄出节略等籍，



如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法句经》之属。又指传记等,如马鸣菩萨、龙树菩萨传等。其次外道录,《胜宗十句义论》、《金七十论》等书。至于疑伪,则指《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》等伪作。此外中国撰述亦依《知津》,分类极详。自全体观之,整然成一组织,固可取也。最近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,另起炉灶,一洗从前之偏见。则于内篇分经、律、论三部,经中废大小乘分别,平列为阿含、本缘、般若、法华、华严、宝积、涅槃、大集等类。自余杂经统为经集类。密教经又别为一类。律论中亦平列各种,不分大小。益以中国、日本二类撰述。最后以史传目录等为外篇,殿焉。此其组织,盖尤其合于论理者也。

我国历代大藏受钦定之限制,撰述一类极多遗漏,于是私家有藏外群书之集成。如明末清初有续藏,又续藏之刊,皆属此类。晚近日人因之为大规模之组织,遂有日本续藏经之刊。所采集之范围本遍印度、中国、日本三地之撰述。但以发行之困难,仅得以中国撰述为主而刊行一部。且中间编制亦始整终乱,然已得一千七百五十六部,七千一百四十四卷矣。后来日本撰述,另以日本大藏经名目印行。同时有《日本佛教全书》之编印,性质相同,而组织有异。其外净土、真宗等各有全书之编辑,日人于此可谓勤也。

第四章 藏经之目录

如前所言,藏经之组织每以目录为根柢,故各种目录之内容不可不知其概略。我国现存经录二十余种中,最古者殆为梁僧祐等所撰《出三藏记集》十五卷。本书著述之确实年代不明,但文中有天监九年(西纪五一〇年)之语,是必成书于其后也。本书最特色处,在保存道安《经录》之一部,使后人得以想像古录为何如。继此录而有隋法经等所撰《众经目录》七卷。书成于开皇十四年(西纪五九四年),备载西土及此土贤圣之撰述,用意周到,为其特色。后来《开元录》著者尝举此录之四误,然其大体固正确可信也。后此有费长房所撰《历代三宝记》十五卷(书成于开皇十七年),唐道宣所出《大唐内典录》十卷(书成于麟德元年)等。续出者犹有数种,但为诸录中之白眉者,唯《开元释教录》。此系开元十八年(西纪七三〇年)智昇所撰,为以前各录之归着

点,复为以后各录之出发点。研究教藏,奉此周旋,他无其伦。本书共二十卷,前十八卷与后二卷判为两类。前类更分总录十卷,别录八卷。总录所收,乃依年代列举自汉迄唐之各译家纪录,则先揭所译书目卷数,分其存缺,更注初载之经录、原著者名氏、译出之次数(即其书有异译者,今译为第几次),乃至译出之年时、译场、参加者,莫不备记。最后系以译者之传记。其网罗各方面,实极完备。录末更举古今经录四十余种,于其现存者一一加以批评。其次别录,分为七条,考译本之有无,明支派之别行(如某种经论中特提一篇一章以分别流行),或补遗,或质疑,对于总录之历史的叙述,此盖有重为组织之趣。内容整理,于兹大备。最末二卷,即为前来各录之综合,举列现存经典五千零四十八卷,标出藏经之定数,遂为一时编辑之标准。要之,本录编辑细密,殆无瑕疵。《四库提要》尝评之曰:佛氏旧文,兹为大备。此虽泛泛之言,亦可见其完备优秀也。

《开元录》收入三藏五千余卷,集为四百八十函,以千字文次第标之,预防混杂。智昇别撰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四卷,载之,遂为后世藏经编号所本。及贞元十五年(西纪七九九年),圆照复撰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三十卷,不过采录开元以后新译各籍,以为《开元录》之补订而已。至于元代至元二十二年(西纪一二八五年),庆吉祥等出《至元法宝勘同录》十卷,始稍稍可注目。我国译经以元代告终,故此录于各目录亦为最后之作。录中于各种原典之梵名颇多举出,且参照西藏经(即所谓蕃本)之目录,对勘汉藏两本之具缺,又于大乘经中特分显密为二,皆其长处也。

是外有撰述可准经录者,为《阅藏知津》。是乃明智旭于崇祯八年(西纪一六三五至五四年)二十年间作成。其主要蓝本为寂晓之《释教汇门标目》,纯属解题之书类,初学检查,却甚便利。所列典籍大都有内容摘要。遇有异译,则标符号以别主伴,而指示各译中之优秀者。又于大乘经改正《开元录》之五大部名目,而依天台五时,另立五类。方等类中特判显密为二,依《至元录》更整理之。以及别立杂藏,收容撰述,皆属其书之特长。独惜作者囿于天台一家之说,大处区分终未得当。又摘要各处类不得纲领,故犹非完本。此则有待今人之别作矣。

《阅藏知津》一书,昔尝为日本研究佛教者所恒用,其在欧美学者之研究,则多重视《南条目录》。此为日人南条文雄英文著作,题云《中



国佛教三藏目录》, *A Catalogu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ripitaka* 以西纪一八八三年于英国牛津刊之, 实即《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》之英译。惟另据《至元录》所载梵名, 傍考泰西梵语学之研究, 而一一确定原典名目, 以与旧译经题并举。又注明经论各种翻译之年代, 及异译等。篇末附录则有历代译家略传。凡是皆足以指示欧美学者知我国藏经内容为何如, 与梵藏各本关系又何若。故凡彼方人士, 研究我国藏经, 群赖为指南, 遂成一代名著。及今视之, 其间不少待订之处, 然无损大体之价值。惜绝版已久, 购求不易耳。此外别有英国学者哀透尔氏 E. J. Eitel 所著《中国佛教必携》, *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* 亦称《爱氏梵汉辞典》。盖列藏经名目、撰译各家, 以及佛教术语等, 皆梵汉并举, 加以简单解释, 颇便检阅。原版以西纪一八七〇年在香港印行, 未几即增订再版。日人高桑驹吉复添索引而翻印, 今尚易购备。惟其中错误颇多, 不可不知。

第五章 参考书目

藏经研究上应有之一般概念, 已如以上各章所述。至于各种专门事项, 须得相当之文献资料以为参考, 始可了然。从来关于藏经研究之著作极少, 在我国撰述中尤渺不可得。无已, 且举日人所作数种以备研究。

- 一 大藏经雕印考 常盘大定稿(西纪一九一三年印)
- 二 一切经ノ由来(一卷) 村上专精著(西纪一九一五年刊)
- 三 佛教圣典概论(一卷) 深浦正文著(西纪一九二四年刊)

第一种曾于《哲学杂志》三百十三号以下连载数次。共分九章, 于中、日、高丽各种藏经版本均有详细之考订, 穿凿入微, 资益后来学者不少, 盖为此学荒原辟除荆棘者也。第二种先载著者主干之《人道讲话杂志》, 题为《大日本藏经史》。后修正单行, 改题今名。于日本藏经历史之叙述外, 并略及我国开雕之各藏。行文平易, 最便初学。第三种最近出版, 自佛说编纂至于翻译刊行, 莫不详细论列。材料既新, 益以参考图版多可珍贵, 实此种研究上最佳之参考书。编者尝据为蓝本, 汇集新出之各家论文创说, 重编为一书如次。

四 佛典泛论(一卷)

此亦可供初学之参考。

其他日人关于此类之论文,散见杂志及辞书者,犹有数种,今不列举。至于欧西著述可供参考者,当以次一书为最。

五 (德文本) *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teratur*. Band II. Von M. Winternitz, 1912.

六 (日译本) 印度佛教文学史(一卷) 中野义照、大佛卫共译(西纪一九二三年)

原本虽注意佛教文学之特质,而于现存巴利文三藏及撰述,乃至梵语佛典之内容组织,均叙述详明,为研究藏经原本最佳之参考。其日译本,系东京帝国大学讲习时随录而成。得讲师高楠顺次郎逐段补注,凡有关系之著译文献,均随文举出,即汇印于篇末,尤予读者莫大之便利,可谓善本也已。